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李欧梵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0

(名家专题精讲)

ISBN 7-309-03371-X

I. 中... II. 李... III. 文学-关系-文化-研究-中国-当代 IV. G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5188 号

目 录

自序	1
1 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	1
2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	19
3 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	47
4 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83
5 上海与香港 :双城记的文化意义	107
6 “批评空间”的开创 ——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127
7 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	149
8 《野草》:希望与失望之间的绝境	171
9 徐志摩 :伊卡洛斯的欢愉	195
10 张爱玲 :沦陷都会的传奇	217

自序

今年5月份,我应陈思和、王晓明教授之邀,再次访问上海。恰巧我的《上海摩登》中译本出版,无意中应和了当下上海愈演愈烈的怀旧浪潮,我似乎也成了引人瞩目的“公众人物”,受到各种媒体的关照。虽然我研究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文化已近二十年,我的“怀旧”不是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的想像性重构,可完全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卷入上海的都市文化流行,成为新都市文化建构的一部分。由于疲于应付各路媒体,我甚至没能好好地邀请我的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效力,这是我一直歉疚于心的。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到上海,将功补过。

也就是这次访问上海期间,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热情邀约加盟他们正在策划中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我对自己的东西一向不闻不问,加之事情实在太多,一时也难以从命。正好季进在和我合作一本书,对我的著作非常熟悉,所以我干脆把这件事全盘委托给他。现在季进已经编好了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我看他费了不少心思,既尽可能照顾了可能的读者对象,又基本反映了我以现代性为中心,从现代文学走向现代文化的治学历程。还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些篇目原来是英文,经过他人译成中文,我要感谢各位译者。如果这些文章还能有助于一些年轻读者,我会感到十分的欣慰。

2002年7月

晚清文化、文学 与现代性



首先我要讲到的是现代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相关的论述,我自己也曾在《对于现代性的追求》这篇文章中进行过探讨。“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学术名词,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名词,甚至文学上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也是后人提出的。也就是说这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据我了解,中文“现代性”这个词是近十几年才造出来的,甚至可能是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目前,modernity的使用频率非常高,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家也大有人在,其中我只提出一位学者,加拿大的Charles Taylor,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两种现代性》,综合了一般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提出现代性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这个传统 Charles Taylor 称之为“科技的传统”,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所谓现代性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西方的启蒙主义以后,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工业革命,到科技发展,甚至到民族国家的建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资本主义,这一系列的潮流似乎已遍及世界各地,无论你是否喜欢它,是否反抗它,这个潮流是不可避免的。韦伯当时创出了一个名词,叫做“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其时他非常矛盾,他认为这种趋势的发展会打破中古欧洲原有的精神世界、宗教世界,因此他一方面提出

“现代性”(modernity)是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

一种模式是从韦伯的思路发展出来,即所谓现代性,就是着重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一套关于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

“合理化”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提出所谓中古世界观的破产和解除(disenchantment)。这个传统后来常为一般的社会学家所用,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现代化”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发展。另外一种模式是 Taylor 自己所做的模式,这是从他的一本书中演变出来的。这本书题 *Sources of the Self*, 即《个体的来源》,其中把西方从古到今所有关于个人、个体、主观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的各个支脉、源流都进行了梳理。他认为所谓现代性,表面看来是从欧洲发展而来的,事实上它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而西方的这一套现代性又是充满矛盾的,其中包括了理性、科学,但是也包括了其他因素,如个人因素、主体性因素、语言和现实的因素,甚至还有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在第三世界国家行得通的问题,等等。他认为这种文化模式是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当它接触到其他文化之时,很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有人认为像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国家,其现代性都源自西方,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是事实上,在文化的内涵上却很难说西方现代性的理论、现代性的发源对于这些国家的文化和现代性的发展有主宰作用。最近我到印度参加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题目本来叫做 *Alternative Modernity*, 即“另类的现代性”,意指有所谓西方的现代性,也有非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与会的学者都认为“另类”这个词毫无必要。

根本世界上就存在着多种现代性,无所谓“另类”。这就引起了我个人目前反思的问题:如果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那么多种现代性又是如何各有其面貌的?这种不同的来源和发展是怎么样的?

另外一种模式是 Taylor 自己所做的模式。他认为所谓现代性,表面看来是从欧洲发展而来的,事实上它蕴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内涵。

如果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那么多种现代性又是如何各有其面貌的?

我想其间产生的诸多问题应该运用比较文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此外,如果我们研究的是多种的现代性,那么事实上理论是不能架空的。要借助比较扎实的史料进行研究和思考,或是多种文体的比较,或是多种资料的累积,慢慢呈现出现代性发展的面貌。我们的一个研究小组目前的主题是 imaginary,台湾学者译为“想像”,其实它不仅意味着想像,而是一种“想像的风貌”,比如当我们想要呈现中国的现代性的风貌时,是要依靠扎实的多方面的研究才能完成的。当然,我们无法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非常详尽的描述,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做一些概括性的工作,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概括的过程中需要相当丰富的史料作为基础,然后再与当前西方关于现代性的几种比较重要的理论进行对话和交流。我认为我自己所做的是一种中介性的、协调性的工作,将各种来源的资料和思想理论进行协调。因此我很难讲出自己的一套模式,这里我只是向各位介绍我自己的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既然讲到多种现代性,那么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呢?这个问题正像是鸡和蛋的问题,所谓“鸡”的说法就是先提出一套理论的语言,然后再用史料来检验;所谓“蛋”的说法就是先找出一大堆史料,再从史料中概括出一个理论轮廓。我的做法是综合式的。我认为从中国文化的范畴来谈,现代性的基本来源是“现代”这两个字,“现”是现今的现,“现代”或说“现世”,这两个词是与“近代”或“近世”合而分、分而合的,恐怕都是由日本引进,均属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创造出的字眼,它们显然都是表示时间,代表了一种新的时间观念。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当然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其主轴放在现代,趋势

我认为我自己所做的是一种中介性的、协调性的工作,将各种来源的资料和思想理论进行协调。

是直线前进的。这种观念认为现在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开创,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从这里就产生了五四时期“厚今薄古”的观念,以及对于“古”和“今”的两分法,中国以前虽有古今之争,但是没有这样的两分法。我认为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其产生的文化土壤有赖于晚清时期,具体来讲,可以追溯到梁启超,因为任何观念在学理上的划分都是学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创造出来之后就要看它是否在广义的文化圈子中有所反应。现代中的创造如果以梁启超为主的话,我们就要检视一下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时间观念有怎样的新看法。

我认为这种现代性的观念实际上是从晚清到五四逐渐酝酿出来的,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

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发展出新的史学方法和历史观,但是梁启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提出了自己的景观、自己的想像,对自己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认定的呢?梁启超著作甚丰,文笔也非常生动,我这里要特别举出他写于1899年的游记《汗漫录》(又名《夏威夷游记》,附在《新大陆游记》之后,见《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在序言中他说:“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县,十七岁后始游他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簸,所冲击,所驱遣,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他自己追溯成为世界人的过程,是因为戊戌政变流亡日本,目睹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又要从亚洲的第一先进国到美国去,在这个过程中写下了《汗漫录》,但是他到达夏威夷后因为种种原因竟未

成行,真正到达新大陆是两三年以后的事。在这篇游记中,他标明时间是西历12月19日,中历11月17日,正是19世纪最后那几天。就在游记的第一页他说自己要开始作世界人,并表示要使用西历,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时间点,尽管在其后的《新大陆游记》中他并未坚持使用西历。之所以冒被指斥为“不爱国”的风险使用西历,主要是求其方便,他说中国已经与世界交流,应该使用大家公用的东西。其后他提到麦哲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少怀壮志”;“任重道远”等等,他用了一系列空间的意象,把自己想像的范围推广到全世界。因此,时间的坐标轴也就自然而然改为西历,已经超越了所谓“天朝的世界观”。梁启超是一个很注重象征意义的人物,他常常领风气之先,但这并不是说他创造了一套哲学的系统或是时间的系统;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探讨西方的时间观念究竟是如何在中国落实的。中历与西历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世纪”的观念,中国人只讲十年、百年,但是在西方“世纪”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特别提到了19世纪,这完全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其后“星期”的引进;“礼拜六”休息日的影响也非常值得关注。1912年民国政府要使用新纪元时遭到群起反对,包括商会、农民。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其始作俑者是梁启超,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西历的人,但他是用日记把自己的思想风貌和时间观念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如果进一步寻找,在公开场合中同时使用中西历的是《申报》。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史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在1899年的登高一呼,在其后十年、二十年间几乎改变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对于时间观念的看法。到五四时期,再到20年代,在中国

探讨西方的时间观念究竟是如何在中国落实的。

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其始作俑者是梁启超。

的城市中已经接受了新的纪元。但是中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仍然保留了一些旧有的观念,因此我认为中国现代生活中存在两套时间观念。

梁启超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像。所谓 Imagined Community 这个论点的提出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差不多十年以前,研究东南亚历史的学者 Benedick Anderson 写过一本书,叫做 *Imagined Communities*(《想像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有一个想像的过程,这个想像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依靠两种非常重要的媒体,一是小说,一是报纸。在一个现在的时间里面,一群人可以经过共同的想像产生一种抽象的共时性,这里“虚空的共时性”一词是借用本雅明的概念。当我们阅读报纸时,就会觉得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有共同的日常生活,而这种共同的日常生活是由共同的时间来控制的,共同的社群也由此形成。有了这种抽象的想像,才有民族国家的基础。与政治学的论述不同,Anderson 的这种观点非常新颖。他提出促成这种想像的是印刷媒体,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不是先有大地、人民和政府,而是先有想像。而这种想像如何使得同一社群的人信服,也要靠印刷媒体。我们可以借用 Anderson 的观点,但还必须做一些补充。另外一个大家所熟知的抽象模式就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问题。公共领域背后的框架也是现代性。在西方 17、18 世纪现代性产生以后,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构成了一种

梁启超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像。

所谓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了民间社会之后才会产生一些公共领域的场所,可以使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对政治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探讨。哈贝马斯举出的实例就是英国、法国18世纪的一些小杂志,这些小杂志源于沙龙,其所载文章大多出自沙龙谈天。谈天的空间、舆论的空间与印刷的空间逐渐构成了所谓公共领域。从哈贝马斯的立场来讲,公共领域的造成基本依靠的仍旧是印刷媒体——报纸和小说,对他来说,小说更为重要,因为小说中的时空模式恰恰符合欧洲18、19世纪中产阶级的行为生活模式。他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借用了西方写实主义小说的研究成果。

从哈贝马斯的立场来讲,公共领域的造成基本依靠的仍旧是印刷媒体——报纸和小说,对他来说,小说更为重要,因为小说中的时空模式恰恰符合欧洲18、19世纪中产阶级的行为生活模式。

民族国家的想像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印刷媒体的功用有赖于其抽象性和散播性,印刷媒体制造出的空间事实上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不像我们现在这种面对面的空间,一份报纸究竟有多少读者是很难精确计算的。美国立国宪章的制订、一整套民主制度的讨论完全依靠印刷媒体,美国宪法之所以能行诸全国而皆准,靠的就是印刷媒体的抽象性,而不是靠面对面的政治模式。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基本上还是面对面的,从梁启超到毛泽东。

民族国家的想像空间和公共领域的空间,其构成基本上都与印刷媒体有关。

如果将以上两种观念挪用到梁启超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观念本身有许多不足之处;而当我们开始从这两种观念的立场来审视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远远超出Anderson和哈贝马斯所提出的问题。哈贝马斯从欧洲的政治制度等很自然地发展到自己的理论;Anderson虽然提到了民族国家背后的背景,比如

背后是帝国,像中国、欧洲和拉美,但是他并未对民族国家背后复杂的文化传统有所理解。而我认为中国最复杂的正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这个说法非常接近陈平原先生的论述。西方事物、观念的进入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启迪,但并不表示它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变化。投石入水,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波纹,我们不能仅从西方的来源审视这些波纹。

这里,我提出所谓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恐怕还得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了解。这时我们就要借助一些学者的研究资料,以便探讨梁启超的贡献。我们如果要把现代性的抽象观念和文化做一些连接的话,其间用于连接的工具又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一方面讲现代性,一方面讲晚清小说、报纸、杂志。两者应当如何连接起来呢?我觉得,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叙述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Anderson说,任何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想像出来之后,势必要为自己造出一套神话,这套神话就称为“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这种“大叙述”是建立在记忆和遗忘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立国都要有一套“大叙述”,然后才会在想像的空间中使得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同。至于“大叙述”,我们暂且不谈实质内容,只谈形式问题,这就与小说有关了。Anderson举的例子是菲律宾的一部小说,大意是说通过想像的共时性,一事情会广为人知。Anderson不是文学家,因此他的分析中有许多东西没有展示出来。

我认为中国最复杂的正在于其文化传统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当一些新观念进入中国晚清的境遇时,它们与中国本身的文化产生了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冲击,这种冲击最后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础。

我觉得,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叙述的问题,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模式把故事叙述出来。

其实这里面还牵涉到文本和读者的问题,读者也是想像出来的,在一个新的想像产生之时,还应该想像出一个读者群,而这个读者群我认为就是想像社群的主要人物。梁启超办报之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说法:“新民说”,要通过报纸重新塑造中国的“新民”,希望能够经由某种最有效的印刷媒体创造出读者群来,并由此开民智。这种看法是相当精英式的,他关于小说的所有言论都是以这种看法为大背景的。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重要文章中,他提出的观点都与小说本身的形式问题无关,而直接关注小说的影响力,所谓“熏”、“浸”、“提”、“刺”等。读者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梁启超想像的读者和他想像的中国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当然,在中国土壤中所生成的模式必定与西方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梁启超的叙事非常有意思,我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假设,这是我从另外一本理论著作中获得的灵感,这本书是我的同事 Summer 写的,题为 *Foundational Fiction*(《立国基础的小说》)。这本书中提到,19 世纪初期,在拉丁美洲,几个国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好几本“大小说”,后来都成为中学教材,广为人知。故事大多是写一男一女经过重重波折最终得到妥协与和解,成婚生子,再现了拉美民族国家兴起的历程。当时拉美国家克服重重障碍即将建国,因此这些半神话的人物就被创造出来,成为国家的代表。如果用这种观点来审视中国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没有这种浪漫的建国小说,勉强可算的是梁启超未完成的《新中国未来记》。

读者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梁启超想像的读者和他想像的中国是一回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晚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在缔造两样东西: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

事展现其雄才大略。所以说故事的人都是大政治家,而不是贩夫走卒所能为。梁启超是孤独的,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没有一位作者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所采用的模式显然来自日本,他在去往日本的船上看到了柴四郎的《佳人奇遇》,爱不释手。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时代广受欢迎的几部翻译小说都出自大政治家手笔,如迪士累利等,而创作小说的作者也都是明治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如德富兄弟等。这些小说不只是政治小说,梁启超将之定名为政治小说,是试图以之影响中国读者,而其想像也最终借以达成。据我的一位同事研究,《佳人奇遇》出版于1901年左右,同时坪内逍遥关于小说精髓的论著也刚刚面世,日后被视作日本最早的小说理论。坪内逍遥非常不喜欢《佳人奇遇》,受他的影响,日本许多理论家都不喜欢这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在日本非常轰动。《佳人奇遇》是用典雅的汉文写出,是一种精英体的写法,同时包含许多演说,非常符合日本明治时代上层知识分子的欣赏需要。梁启超翻译起来得心应手。故事开头发生在美国费城,主人公名为东海散士,划船时遇到两位美女,完全是桃花源式的,但是这时的桃花源是在象征着独立、自由的美国。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很明显是套用了这个模式,同时也受到了英国小说《百年一觉》的影响,把一个理想的故事放在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前,再从那个时间往回看。这种做法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密切相合。梁启超在构思《新中国未来记》时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他在构思上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这部小说创作上呈现出的成果。事实上,成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的构思。夏晓虹讲得非常有条理,这部小说是一个多文体的整合,不只是叙

梁启超非常注重小说的叙事功能,试图以小说中的故事展现其雄才大略。

述文体,也包括演说、对话等,直到第五章才有点像晚清小说。它第一次为中国塑造了一个政治形体,在梁启超的小说中所有的人都会说中文,大家都在博览会上听孔博士的演讲。日本学者清水贤一郎特别研究了这部小说,指出眉批也很重要,这种眉批直接把叙事与读者联系起来。小说中孔博士的演讲是从将来的立场出发的,而眉批和注则是从现在的立场出发的。眉批有两个功用,一是半上层的建筑,另一功用则与想像社群相关。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煞费周章,他要殚精竭虑用从未用过的方法说一个从未说过的故事,这些方法虽有本源,但他对于这些方法的运用已经打破了一些中国重要的传统。然而他的努力并不特别有效,因为他所想像的读者实际的阅读习惯与他的写作方法格格不入。

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煞费周章,他要殚精竭虑用从未用过的方法说一个从未说过的故事,这些方法虽有本源,但他对于这些方法的运用已经打破了一些中国重要的传统。

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究竟读者群的阅读习惯是什么?目前还没人能够解答。如果读者群的阅读习惯与作家、作者的想像不合的话,那么所谓民族国家想像社群的建设工作就会打折扣。就我个人理解,当时读者群看报纸、看杂志的阅读习惯是与传统阅读习惯一致的,他们看的仍旧是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大多用文言写成,如《花月痕》、《玉梨魂》等。小说以“佳人”为主,才子总是处于弱势,常见的模式是一男两女,互相迁就。我们很难想像这种才子佳人,会变成英雄豪杰,其间的距离非常巨大。换言之,你很难使当时的中国读者想像出像梁启超笔下的李去病、黄克强之类的“创世英雄”形象。《新中国未来记》中有一位女将,只见其名,未见其人,如果这部小说没有中道而折的话,这位女将很可能就会上场,我想她的形象应该很像此后

妇女杂志塑造出来的一些人物,是精通诗词歌赋的巾帼英雄,受过教育,思想开放,为国捐躯。后来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人物,就是秋瑾。我们可以看出,当胆识过人者如梁启超,开始要对一种新的民族想像作大叙事的时候,他并未预料到中国读者群将会不合作。但是梁启超又何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就牵涉到我下面即将提到的两个观点。

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像,其风貌和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而其所借助的印刷媒体,如报章杂志,在晚清种类繁多,这又不禁使我们关注为这些报章杂志写稿的人。中国和日本、美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建国时代的报纸其撰稿人都是第一流的名人,用化名写稿,互相讨论政治,这被公认为是美国的公共空间,非常明显的公共领域模式;日本明治时期的报纸,尤其是大报,总主笔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中国的报人中,梁启超算是一流人物,但是其余大多数人就很难说了。随着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终结,知识分子已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参与办报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视的“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认为恰恰就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像。这些人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有雄才大略,想像力丰富,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化工作者,或画画,或写文章,从大量的文化资源中移花接木,迅速地营造出一系列意向。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则必须关注文本,要大量地阅读晚清小说和报章杂志,正像陈平原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附记中所提到的方法,比如他在一张表格中把年代、创作小说、翻译小说、小说论文、文化背景全部列出,

当胆识过人者如梁启超,开始要对一种新的民族想像作大叙事的时候,他并未预料到中国读者群将会不合作。